



中国人文学研究的“理”与“势”

Accomplishment and Influence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umanities

彭国翔(浙江大学)

Guoxiang Peng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Email: guoxiang.peng@gmail.com

摘要

中国人文学研究早已不只是中国学者从事的领域，只要在学术上真正有所建立，自然会在广大的学术共同体中得到认可。前者是“理”，后者是“势”。任何在学术上真有建树的学者所在之处，便是学术的“中心”。学术“中心”取决于学人的所在，与地域无关。中国大陆之外世界范围内从事中国人文学的学者，尤其是中国大陆之外华语世界从事中国人文学的学者，历来在中国人文学研究的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面对近十年来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新局面及其产生的影响，中国之外华语世界的人文学者如何与中国大陆清醒的人文学者一道，在中国人文学研究的“理”与“势”之间进一步发挥应有的作用，值得全球从事中国人文学研究的学者深思熟虑。

关键词： 中国人文学、理、势、中国大陆之外的中国人文学者

Abstract

The study of Chinese humanities has always not been exclusive to Chinese scholars of China. With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umanities, any scholar, Chinese or non-Chinese,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ith his/her influence. Wherever this kind of scholars goes, the place accordingly becomes the center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中国人文学研究的“理”与“势”

humanities. The center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humanities relies on the accomplished scholar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geographic regions. Those scholars in Chinese humanities who are outside China,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outside China,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umanities. Given the new ideological trend in China and its domestic and global impact, the scholars in Chinese humanities outside China, together with Chinese scholars without nationalist mentality, should make further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humanities and play an influential role. This deserves to be pondered by all scholars in Chinese humanities around the world.

Keywords: Chinese humanities, Accomplishment, Influence, Scholars of Chinese humanities outside China





今年初我在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担任研究员（Fellow）时，由于高研院有支持现任研究员邀请其它机构的学人到高研院举办学术活动的政策，我便打算邀请数位在欧洲从事中国人文学（Chinese humanities）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举办一场以“海外中国人文学的研究及其意义”为题的为期一天的小型研讨会。受邀者以德国学者为主，也包括欧洲其它一些国家的学者。但无论如何，这些学者专长的研究，都在中国人文学的领域之内，尤以中国哲学、历史和宗教为主。并且，这几位学者无一例外均非华裔。当然，柏林高研院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员中有关及有兴趣者，也在欢迎之列。在我看来，当今之际，如何从一个全球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人文学研究，如何理解中国大陆之外的人文学研究所能和所当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其中涉及的“理”与“势”的问题，在目前中国大陆意识形态所造成的近乎“万马齐喑”的局势之下，似乎尤为重要，值得世界范围内从事中国人文学研究的学者思考。

我的这一计划获得了柏林高研院院方的大力支持，原本已经列入了4月初的日程。可惜的是，由于三月中旬疫情已经在全球蔓延，三月底德国进入紧急状态。高研院不得不随之调整了所有的日常活动，从4月开始的这类学术活动，也自然都取消了。就连高研院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即每周二以院内研究员为主体的专题研讨会（colloquium），也只能以zoom的方式在网上进行了。不过，研讨会虽然无法进行，问题却并未消失。

关于中国人文学的研究，并不只是在中国（P. R. China）由中国学者（Chinese scholars）从事的学术领域。世界各地都有一定数量从事中国人文研究的不同族裔的学者。在这个群体当中，既有虽然在种族的意义上是华人但在法律的意义并非中国公民的人士，也有在种族与国籍双重的意义上均与中国无关的研究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文学的研究早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共业。

记得2011年在香港的一次关于明史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治明史的学者与一位香港本地高校的学者之间，在有关1960-1970年代中国大陆的历史境况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两位学者在学界都有一定声誉。前者年资较长，言语之间表达出了对于后者的不屑，认为后者没有身在局中，并不了解当时中国大陆的情况，没有资格与他争论。殊不知，那位香港高校的学者其实非但那个时代身在中国大陆，本人经历了那场“浩劫”，而且还一度参加了“红卫兵”，只是后来才离开大陆，到西方接受了专业的学术训练之后在台湾和香港任教。因此，面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不以为然，那位在香港高校任教的学者立刻表明了自己的经历，令前者一时语塞。

中国社会科学院那位学者无形中流露出来的心理，显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所谓的“局外人”能否对中国的人文学进行鞭辟入里的研究？可以想象，如果那位香港





学者没有一番“局内人”的经验，面对质疑，是否便无言应对了呢？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与会的还有一位在美国任教的华人女士，她在香港出生长大，并没有像那位先生一样有中国大陆的经历。不过，她显然并不认同中国社科院那位学者的心态，当时便立刻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位女士对于中国文学史尤其明清之际妇女史的研究，造诣深厚，已经获得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认可。所以，虽然并不在中国本土，也主要并不以中文写作，但她对于中国人文学的研究，较之身在中国且以中文写作的很多同一领域的学者，水准却是远在其上。毫无疑问，她的例子表明，中国人文学研究的成就，与是否身在中国并无必然的关系。

事实上，熟悉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人士都知道，二十世纪初，在以胡适、陈垣、陈寅恪、傅斯年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中，很多人不免都有一种心态，即希望将世界“汉学”研究中心的地位从中国之外的欧洲转移到中国。这一点也说明，那时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的中心，已经不在中国本土。并且，“汉学”领域的顶尖大师，往往非但不是中国本土的学者，甚至根本不是华人学者。杨联陞曾经回忆 1945 年 2 月 10 日胡适和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在哈佛再次相遇时的场景。在杨联陞的眼中，伯希和对胡适“并未表示多少敬意”，以至于作为华人学者的杨联陞“难免有几分不快”。对此，杨联陞的解释是“胡先生大约因为他知道多种语文，目录学很可观，中文颇好，人特别聪明，就让他几分。”¹显然，由伯希和在胡适面前“当仁不让”的这一故事可见，至少在伯希和本人看来，“汉学”的权威并不只有胡适这样的中国学者，他本人完全有过之而不及。

当然，“汉学”（sinology）与“中国人文学”在内容方面并不完全相同。“汉学”的特定内容与研究方法，要求中文之外的许多语文作为研究者必需的智识装备（intellectual equipments），这也是当时欧洲学者较之中国学者往往更有优势的一个方面。陈寅恪从西方游学归国之后，一度欲以西方“汉学”作为自己的治学的方向，但后来不久即放弃了欲与欧洲那些汉学大师“竞胜”的想法，从西北史地这一更接近欧洲“汉学”的领域转向中国中古史的研究，相当一部分原因正与此相关。而“中国人文学”则以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和艺术为其主要内容，并不一定需要太多尤其那些冷僻的语文工具。但是，虽然如此，在“汉学”和“中国人文学”这二者之间，毕竟还是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合。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变化，一方面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逐渐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一方面“汉学”越来越让位于“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海外无论是“中国研究”还是传统“汉学”与“中国人文学”之间相当程度重合的情况，也并未有所改变。

¹ 参见李若虹，〈卜居与飘零：胡适在哈佛任教的一年〉，《文汇学人》，2018 年 11 月 18 日版。





比较中国学者 (Chinese scholars) 与非华人学者 (non-Chinese scholars) 在中国人文学研究方面各自的长短, 是一个很难一概而论的大问题。不过, 如果我们分别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和之后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来看的话, 或许可以做出一些尽管粗略但未尝没有一定提示意义的观察。大体而言, 二十世纪上半叶, 中国学者由于尚未与自己的人文传统中断, 较之非华人学者, 可以说基本上在中国人文学的领域具备更为广阔和深厚的知识储备。但是, 这一优势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 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之中, 在中国大陆几乎丧失殆尽, 只能在海外华人学者不绝如缕的薪火相传之中得以保存。当然,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 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 中国的人文传统终于不再是批判和否定的对象, 中国人文学也随之迎来了新的生机。可以看到, 在中国大陆五十年代以来出生的研究中国人文学的学者当中, 如今已经涌现了不少在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和艺术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其中, 既有将至“从心”之年的资深学者, 也有刚过“不惑”之年的后进新秀, 更有已“知天命”的壮年中坚。不过, 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反传统潮流的冲击之后, 中国人文学在中国大陆的重建, 仍然可以说处在一个“反传统的传统”

(the tradition of anti-tradition) 之中。“西学”的吸收与了解方面自不必说, 这是无法与西方学者“华山论剑”的。即便在“中学”的继承与掌握方面, 或者说在中国人文学的知识储备和专业训练方面, 很大程度上也不再具有二十世纪上半叶华人学者所拥有的那种优势了。

本来, 上个世纪最后的二十年, 在中国大陆从事中国人文学的一线学者当中, 很多对于这种情况已经不无高度的自觉。在这种自觉的基础上, 他们当中的一批人, 已经在中西两个方面勉力进取。有些学者西方语文能力不足, 在西学方面或有短处, 但中国人文学的文献基础植根深厚, 能够彰显其“中学”尤其中国文史方面的长处。有些学者借中西交流以及自身西语能力之便, 可以追赶西学方面的前沿。还有些学者则在很大程度上接续以至发扬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已然建立而一度被摧毁的“学贯中西”的传统, 为中国学人重新登上世界中国人文学的舞台做出了贡献。当然, 这都是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较为开明的风气之下产生的良好趋势。照此趋势发展下去, 假以时日, 相信中国大陆从事中国人文学的学者一定会像昔日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人那样, 在深植中国人文学传统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humanities) 的基础上吸收和消化西学之长, 与海外从事中国人文学的非华人学者们一道, 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中国人文学研究的崭新局面。

2012 年台北举办的“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上, 虽然未能亲自赴会但是担任大会总召集人的余英时先生有一篇致辞。在该篇致辞中, 余先生回顾了二十世纪初中国若干





学人希望将“汉学”中心由欧洲甚至东京搬回北京的心态。但余先生在此基础上特别指出，如今已经不再需要考虑这一问题了，因为世界范围内的“汉学”中心已经无所在或者说无处不在了。²显然，余先生的这一观察是极为精准的。的确，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中国人文学研究已经呈现出了“去中心化”和“多元化”的状态。世界各地如今都有研究中国人文学的群体，虽大小不一，然各具特色。彼此互动互补，已然不存在那种以某一个或几个地点为中心的局面。作为与会者，我当时即对这一说法感受颇深，极为认同。我相信，这应该不只是余先生的一种客观的判断，同时也未必不是其心中的主张。对余先生来说，既然“中国这块土地上现在反而没有中国了”（这是香港电台制作的“杰出华人系列之余英时”电视节目中余先生亲口说的话），那么，中国人文学研究的中心，又如何一定需要并且能够在中国呢？

梅贻琦先生曾有“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而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这句话至少在中文世界已经是大家几乎耳熟能详的了。其实，现代学术建立之初，中国那些一流的高等学府，其声誉的建立，正是因为聚集和培养了一批在学术上造诣一流的学者。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杰出的学者，才使得这些大学成为一流的大学。记得一位西方学者说过，对于任何一所大学，尤其是享有声誉的大学，其中的教授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学校的名声要依赖这些教授，另一种是这些教授的名声要仰仗学校的光环。这一观察，非但西方如此，中国恐怕更是如此。前一种教授无论到哪里，都是一流的学者；后者不仅不能成为其所在学术机构光环的光源之一，反而不过是其所在学术机构光环的反光板，离开所在的学术机构，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免就要被打回原形，“泯然众人矣”了。显而易见，如果一所原本依赖一流学者的学术机构逐渐失去了那些一流的学者，不断进入的都是那些冀望借助机构的名声而给自己“增重”的二流、三流人物，那么，可想而知，该机构当初依靠一流学者建立起来的声誉，必然会逐渐丧失，一流学术机构也就每下愈况，注定会变成二流、三流的了。

事实上，任何学者只要要在学术上真正有所建立，相应要在广大的学术共同体中得到普遍认可，其所在之处都可以成为学术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究极而言，学术的“中心”取决于学人的所在，与地域并无本质的关联。如果说“中心”的意思是指学术思想上的声望和影响，那么，毫无疑问，这种声望和影响的形成，应该建立在该“中心”的学者所具有的学术成就这一基础之上。换言之，学术声望和影响应当是学术成就的自然结果。作为一种影响力，学术声望可以说是某种“势”，而包括知识的建立和思想的创造在内的学术成就，则是学术之“理”。“势”必须以“理”为据，才能免于“虚张”，

² 余英时，“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开幕致辞”，彭小妍主编，《跨文化实践：现代华文文学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页1。





不流于“虚誉”，也才能“终久大”而不至于“竟浮沉”。这一点，对于包括中国人文学在内的所有学术来说，恐怕是一个普遍的原则。

显然，在这样一种“理”“势”观之下，我们如今已经大可不必再有二十世纪初中国学人那种地域性的“中心”意识，而是要面对世界各地中国人文学研究不同群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局势，培养一种“诸子”学的胸襟和自觉。换言之，“中心”无定在，不当以地域为限。只要有真正的学术成就，哪里皆可成为“中心”。“理”之所在，“势”亦随之。所谓“在深植中国人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和消化西学之长，与海外从事中国人文学的非华人学者们一道，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中国人文学研究的崭新局面”，作为一种胸襟、自觉和实践，正是这样一种“理”“势”观的必然反映。

这种“理”“势”观固然应当是学术的通则，然而，对于中国人文学的研究来说，认清这种“理”与“势”之间的关系，如今格外重要。相对于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原本便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不易具有普遍而客观的衡量标准，往往“理未易明”。在“势”与“理”相悖，前者“虚张”而流于“虚誉”的情况下，仅仅从外部的声势上，便无从判断学者的真实成就。所谓“徒有其名”乃至“欺世盗名”，正是那种“理”为“势”所掩的结果。那么，在中国人文学的领域，如何判断“势”非“虚张”而是作为真实学术成就的“理”的自然结果呢？尤其是，对于有志于中国人文学的学者来说，是求“理”不计其“势”（只要有“理”，往往“势”自在其中）？还是不计“理”之有无，刻意借助种种“非理”的手段自造其“势”呢？这其中，大有可辨者在。

前已指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所造就的开明风气之下，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文学研究已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样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国人文学研究的健全发展，一方面需要“摆脱西方中心取向”、“最少以西方观念做比附”，通过中国人文学传统的“种种内在线索，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对于西方学术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仍需“各就所需，多方吸收”。³ 然而，这一可喜的态势在最近十年当中不幸发生了相当程度的逆转。在依然是“政治挂帅”这一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新传统左右之下，意识形态新动向在中国人文学研究领域的直接影响所及，便是一批学者闻风而起、附为骥尾。这些人一方面不具备深厚的中国传统学术修养，另一方面不能也不愿吸收和消化西方的学术，无法进入世界学术的共同体。总之，他们既不愿在学术的园地辛勤耕耘，自然缺乏深广的积累，无法产出坚实的学术成果。但是，他们却渴望获得学术界的声名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无理”，不能“据理以生势”，于是，他们便只能采取“造势”的方式，似乎只要形成某种势力，便俨然有了学术成就。这一点，已然成

³ 余英时，“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页 296-297。





为当今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文学界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做出观察和分析。

在目前的中国大陆，中国人文学领域的“造势”大体不外两种。一种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江湖文化中的惯常做法，通过拉帮结伙、相互吹捧达到建立声名的目的。除此之外，另一种颇为行之有效的方式，便是紧随眼下意识形态“主旋律”的“东风”，以排斥西方为名，行自我造势之实。这种自我造势的方法不仅最为安全，而且由于符合“正确路线”，也最能够获得各种资源。显然，在一个依然是权力本位的社会和文化当中，所有资源都掌握在权力的手中。只要向权力这个最大的“势”输诚，自然便会得到支持从而形成势力。而一旦“得势”，在权力掌控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俨然便成了不言而喻的具备学术成就的“大师”。一部分学者不以学术思想的建树为务，而对行政职务汲汲以求。当然是拥有了权力便自动变成有学术成就的学者这一现实的反映。这一现实，正是那种颠倒扭曲了的理势观的反映。但是，缺乏“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专业学术成就，仅以这样两种方式粉墨登场，固然可以在中国的学界江湖“自娱自乐”，而无法进入世界学术的共同体，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与海内外中国人文学的方家交流切磋，便是在所难免的了。如果在中国“得势”的有相当一批这种人物，中国的人文学学术又如何能够在世界范围真正获得尊重呢？

上述两种造势的方式，往往是彼此交织在一起而相互支援的。并且，处心积虑如此造势者，不但自己在现有的体制下以各种方式占据学术机构的相关位置，也极力安插追随自己的门生到各个学术机构，以扶植自己的势力。有些学生缺乏判断力，不免为势所转，以为那些头上顶着著名学术机构的牌子、经常在热闹场中抛头露面者便是学术上真有成就的学者。有些学生则是自觉地趋炎附势，并不在意这些学者是否具备真才实学，而只在乎他们是否拥有权力，是否可以为自己带来实际的利益。比如说，在学界缺乏健全评估机制的情况下，如果学术论文的发表、学术著作的出版、工作岗位的聘任乃至学术职称的评聘都严重向权力而非学术本身倾斜的话，那么，利害之下，很多学生自然会投身那些有“势”而未必有“理”者的门下了。

当然，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受害的无疑是学术本身。纵观中国大陆近十年来的学术界，至少就中国人文学的领域而言，很不幸地，各种或明或暗紧随意识形态指挥棒的话语和论说，包括诸如中国的人文学已经可以“自说自话”、中国人文学的“中心”必须在中国之类的宣称，已经俯拾皆是，成了一些学界中人心照不宣的“机括”。再加上江湖文化的沉渣泛起，可以说，一种“重势轻理”、“理为势掩”的文化已然形成，且迄今为止只见其益、未见其损。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既然中国人文学早已不再只是身在中国大陆的国学者所能从事的学问，海外的中国人文学者尤其是海外中文世界的中国人文学者所能和所





当发挥的作用，便格外值得关注了。

无论是建立知识还是创造思想，在中国人文学“理”的这两个方面，中国大陆之外从事中国人文学的学者们一直以来都有建树和贡献。这一点，是无需赘言的。在中国大陆新的意识形态环境之下，海外的中国人文学研究是否能够始终坚持以“理”为标准，而不是随势俯仰，如今具有特别的意义。一般说来，海外从事中国人文学的学者无需在中国大陆的权力结构之下讨生活，自然不必随其势而起舞。不过，这些年来，中国的权力结构不仅以重金延揽了科技方面的海外人才为其服务，也刻意扶植了一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海外学者为其背书。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者所追求的已经是中国权力结构的“势”，而不再是中国人文学的“理”了。

所幸的是，广大海外的中国人文学者对此已有高度的警惕，不仅并没有都为势所转，对于中国人文学界那种配合权力“以势掩理”的风气以及这种风气之下真实学术水准的必然降低，反而有着冷静的观察和批评。如此一来，中国大陆那些即便一度为“势”所裹挟的人文学者，如果能够了解世界范围内中国人文学研究的整体面貌，便有可能避免“坐井观天”的局限，摆脱“势”的网罗，最终回归于“理”。这一点，是海外中国人文学在维系“理”之不坠方面的重要功能和贡献。当然，在中国大陆，原本也有很多清醒和冷静的人文学者，一直自觉地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文学研究的整体脉络中耕耘，并未被意识形态的势力网罗所拘囿和羁绊。



除了建立知识和创造思想之外，如果说人文学还有传承文化与价值的职能，那么，海外中国人文学领域中的华人学者，或者说中国大陆之外中文世界（或者叫华语世界/Chinese-speaking world）的人文学者，在这一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离散海外的华人人文学者，在对海峡两岸政权都不认同的情况下，很自然地产生了“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的自觉。而“文化中国”的涵义，可以说正是中国人文学所构成的意义与价值的世界。无可否认的，海外的华人学者都不免与这个意义与价值的世界有着或多或少、千丝万缕的联系。哪怕是出生和成长都在中国之外，但只要具有华裔的血统，尤其是具有中国文化的家庭背景，那么，对于中国的人文传统，在客观的知识和思想之外，总不免会在传承文化与价值发挥一定的作用。而那些自觉承担这一职能的华裔人文学者，在中国人文学之“理”的方面，其能够和应当做出的贡献，如今就更加值得期待了。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当中国的人文传统在中国大陆这一中国人文学的原乡饱受摧残的时候，海外的中国人文学者，尤其是海外中文世界的中国人文学者，对于中国人文传统的薪火相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海外的中国人文学尤其海外华人学者在中国人文学领域所建立的“理”，





在“反哺”中国大陆人文学界，接引中国大陆新一代的人文学者方面，同样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种“理”的基础之上自然而生的“势”，便是中国人文传统的浴火重生。二十一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中国人文学一方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随着所谓的“国学热”、“儒学热”，也日益面临政治化和商业化的双重挑战。⁴尤其晚近十年来，在意识形态新的变局之中，中国人文学在表面的繁荣之下实际所遭遇的危机，其程度比“五四”时期所受到的批判或许更加严重。那么，在这一新的历史关节点上，海外的中国人文学者，尤其是中文世界的人文学者，又将如何发挥其能够发挥和应该发挥的作用呢？对此，我想我们依然可以充满信心。

中国大陆之外的中文世界，除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其它东亚地区这些华人较为集中的地方之外，也包括在欧、美、澳等西方世界的华人社群（Chinese Diaspora）。在这些地方，二十世纪以来，在中国人文学的领域，不断有杰出和优秀的学者在建立知识、创造思想以及传承文化和价值的这一“理”的方面有所贡献。这里提到的不同地区，除了马来西亚我迄今尚未驻足之外，其它地方，我都或多或少亲身见证了中国人文学研究发展的局面。不久之前，魏月萍教授告知她正接任马来西亚《依大学刊》主编，雅意邀我为创刊号撰稿。当时，我虽然已经开始考虑开头提到的柏林高等研究院的小型研讨会，但尚未实际着手。月萍教授的邀稿，也促使我得以进一步斟酌我希望表达的意思。虽然柏林的计划因疫情而终止，但是，我对中国人文学研究的“理”与“势”这一课题的想法，却与这两件具有内在关联的事情有着直接的关系。或者说，正是这两件事情，尤其是月萍教授的约稿，让我无法怠惰，必须将自己相关的想法暂时先整理出来。这一点，是我要向月萍教授表示感谢的。

我很高兴我的想法可以首先在《依大学刊》这份马来西亚的华文刊物发表。正如前文所说，我历来认为，中国人文学的研究在中国之外的很多不同地区，都各有特色。中国学者那种“中心”的思维模式，早就应该改弦更张了。我由衷地希望，马来西亚从事中国人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和世界范围内所有从事中国人文学研究的同行们一道，建立更多的新知，创造更多的新思，在“理”的基础上形成自然之“势”，从而推动中国人文学研究的“日新月异”。同时，也为将中国人文学的价值展示给世人做出新的贡献。

⁴ 参见我的“Inside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n Mainland China: The Vicissitud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 an Example”, *Oriens Extremus*, Vol.49, 2010, pp.225-235. 该文增订版也收入 Philip J. Ivanhoe and Sungmoom Kim (ed.), *Confucianism, A Habit of the Heart: Bellah, Civil Religion, and East Asia* (Chapter 3), New York: SUNY Press, 2016, pp. 71-84.



【征引文献】

一、 中文文献

李若虹, 〈卜居与飘零: 胡适在哈佛任教的一年〉, 《文汇学人》, 2018 年 11 月 18 日版。

余英时, 《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007。

彭小妍主编, 《跨文化实践: 现代华文文学文化》, 台北: 中央研究院, 2013。

二、 英文文献

Guoxiang Peng, “Inside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n Mainland China: The Vicissitud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 an Example”, Philip J. Ivanhoe and Sungmoom Kim (ed.), *Confucianism, A Habit of the Heart: Bellah, Civil Religion, and East Asia* (Chapter 3), New York: SUNY Press, 2016.